

1915年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斗争述略

□谢忠强 [运城学院 运城 044000]

[摘要]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开,上海各界反应迅速。除了集会抗议活动外,上海各界还发动了抵制日货和爱国储金运动。虽然上海各界的一系列斗争未能改变袁世凯承认卖国条约的结局,但仍然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上海民众; 反对“二十一条”; 集会抗议; 经济斗争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3)03-0061-04

在上海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是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深刻反映了上海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积极的政治参与意识,更从侧面勾勒出了近代转型过程中上海的城市性格。本文拟依据各种零星史料的相互印证,对上海民众因反对“二十一条”所掀起的一系列斗争进行初步的梳理,权充引玉之砖。

一、举行集会抗议活动

集会抗议,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斗争的产物和方式。受西学东渐和辛亥革命的影响,作为政治意愿表达方式的集会抗议,在民初上海社会公众政治参与意识普遍提高的历史语境下已经较为普遍。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独占中国。消息传开,最先行动起来的是留日学生。2月11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反对‘二十一条’,冒雨在东京集会,决议一致抵御外侮,誓死不承认日本的无理要求;设机关于京、沪。14日,选举驻京沪代表。15日,成立评议部。20日,各代表由长崎归国,分赴京、沪等地”^{[1]794}。2月14日,方梦超、潘梦民、黄毅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国民对日同志会。2月24日,留日学生举定代表回国组织国民大会,是日十三省代表十三人乘日轮“春日丸”抵沪,寓三洋泾桥鸿发栈^{[1]794}。2月25日,黄兴在美国为“二十一条”交涉与旅居南洋的李烈钧、柏文蔚等往返函商,并联名通电上海各报,谓“自后非有社会真正要求,绝

不轻言国事”,主张“暂停革命”,一致对外^{[1]795}。3月1日,留日学生回沪代表以全体留日学生名义发表《泣告全国同胞书》,揭露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指出所提“诸条件,即有其一,既足亡吾国而有余”,表示“对日本此次之要求,无论一部、全部,皆在拒绝之列,即吾现政府承认之,吾国民绝对不能承认之”,并向国人呼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为亡国前之雄魂不为亡国后之遗民”^[2]。

受亡国危机的逼迫和留日爱国青年的激励与带动,上海爱国民众群情激奋。1915年3月18日,“下午1时,留日回国学生代表与中华民国请愿会、国民对日同志会、进步党及各界群众为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在张园安凯第召开国民大会。与会者三、四万人。大会主席詹天民报告开会宗旨,留日学生代表萧汝霖演说,揭露日本政府侵略中国之野心。会间工部局巡捕干涉集会,殴打民众,群情激奋,不肯解散。大会致电袁世凯,谓‘国家存亡在此一举,18日开会张园,至者三万人,皆愿毁家捐躯,以纾国难,恳中止谈判,宣誓条件,筹备武事’。又致电各省将军、巡按使、镇守使、商会、教育会,谓‘日人增兵强索,存亡呼吸,沪开国民大会,到三万人,已电请中央战,祈奋起抵死御侮’。国民对日同志会致电袁世凯,为反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谓‘民等宁为战败忠魂,不作亡国奴隶’^{[3]186}。

上海民众的“张园集会”标志着上海民众大规模反对“二十一条”抗议活动的正式展开,同时也引起了袁世凯卖国政府的恐慌,随后政事堂电布各省,谓“一切排日举动应力为谕止,现在交涉未了,

[收稿日期] 2012-10-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70040);上海大学“211工程”第三期项目(A.15-A 011-09-001)。

[作者简介] 谢忠强(1980-)男,运城学院思政部副教授,上海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民气不宜嚣张”^[4]。然而,卖国政府的色厉内荏在上海民众日益高涨的爱国热情面前反更形苍白、猥琐。之后,上海各界大小集会不断。

1915年5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交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完全接受“二十一条”最后修正案。日本帝国主义的咄咄逼人再一次激发了上海民众的爱国怒火,5月9日再次爆发数万人以上规模的大型集会抗议活动。据报载,“自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并发出最后通牒以后,上海民众纷纷集会对此表示抗议,并敦促北京政府拒绝日方的无理要求。今日,就在最后通牒到期前几个小时,4万多民众在林荫路荒地召开国民大会,表示了誓死抵抗的决心。就在国民大会召开的同时,不久前成立的中华救国储金团也举行千人集会,并当场认捐70多万元。到傍晚6时,最后通牒期临之时,全体与会者手持储金券,高呼‘千万勿忘今时之5月9日6点钟’”^[5]。

二、抵制日货及爱国储金运动

上海社会各界举行集会抗议的同时,也从上海作为工商大埠的城市特点出发,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斗争。

早在1915年2月份上海报纸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事情进行披露之初,上海工商界就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的爱国立场。2月17日,“上海洋货商业公会”致电北京政府,“电请据理与日交涉”^{[6]42}。28日,上海商人代表再电,力主“宁抛全国生命,不失一分主权”^{[6]91}。

在中日交涉期间,上海工商界的公开电报此起彼伏,然北京政府态度暧昧,从未正面积极回复。有鉴于此,上海工商界双管齐下,在呼吁政府积极抵制“二十一条”的同时,也从自身业务出发,拿起了经济斗争的武器。

1915年3月16日,劝用国货会在宁波同乡会议事厅开成立大会,公举虞洽卿为会长,黄少岩、王正廷为副会长,“讨论修改章程,决议进行办法”^{[1]796}。3月19日,上海人民群众自发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许多群众聚集在公共租界内各日本商店门前,劝阻同胞入购日货。这些商店只得相率闭门。儿童们手持装有铁钩的竹杆,到处捣毁日货广告。沪宁车站前树立的日本仁丹大广告牌,也被人们破坏。市内到处有人散发抵制日货的传单^{[7]8-9}。在各界群众的参与、推动下,上海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逐渐扩

大,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得到了几乎所有商帮的影响与支持。据4月17日《申报》统计,“本埠商界自提倡国货以来,积极进行成效昭著。兹查各商号赞成维持国货者,计宁绍帮三千五百二十八家、广肇帮三千八百零五家、潮州帮二千一百十六家、山东帮一千五百十二家、福建帮一千二百六十家、杨镇帮一千九百八十四家、川帮(即东西两洞庭)九百零七家、苏帮八百六十六家,以上均已报告各帮公所及同乡会,此外未经报告者不知凡几也”^[8]。在抵制日货运动的激励下,上海甚至还一度出现了国货公司。据4月18日《申报》披露,“国货维持会为提倡国货起见拟召集股本二十万两组织一中华国货有限公司,专事贩卖国货及纺织物品,先设总公司于上海然后再设分公司于各省各埠”^[9]。

除了抵制日货,力图在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之外,“爱国储金运动”也是上海社会各界抗议“二十一条”的重要内容。

1915年3月27日,旅沪商人马佐臣鉴于日本政府逼迫北京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化名一爱国华人,致函《字林西报》,提出为拯救处于存亡之中的祖国,凡我国人应立即捐献财产的十分之一,作为救国捐,将此捐款存在中国银行,其总数如在一年内未能收足5000万元,则捐款人收回捐款,并以五厘计息。倘若收足5000万元,则不能收回捐款,专门用于建造兵工厂、添募陆军或整顿海军和提倡实业。此外,马佐臣提议中国银行应专门印制救国捐收据给捐款人,并将其所收的捐款数及捐款人姓名刊登于官方报刊上。4月3日,救国储金临时通讯处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泰和里91号设立,马佐臣任处长。自此,救国储金运动逐渐展开^{[3]185}。4月7日下午4时,救国储金发起人马佐臣、虞洽卿、朱葆三等在公共租界二马路(今九江路)华庆园开会,决定建立中华储金救国团,自8日起救国储金临时通讯处改名为中国储金总事务所,推举虞洽卿为临时正干事,贝润生、马佐臣、陈炳谦、狄楚清为副干事,筹办救国储金。9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办收受救国储金业务,从上午9时至下午4时止,前往投储者络绎不绝,第一天就收储金1.9万元,而且因为人多拥挤,许多人还来不及缴款投储。14日,中华救国储金团总事务所开会,制定《中华救国储金团暂行简章》,决定本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设总事务所于上海,储金专门为国家增添武装设备而用,如何使用应由代表会议决定。此后救国储金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汉口、天津、湖南、广东

等省市都逐渐设立储金事务所。至6月底,仅上海一地就已收储银元约70万元,银两近4000两^{[3]186}。

三、对于斗争特点和意义的分析与总结

1915年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从集会抗议到抵制日货和爱国储金运动,不仅充分表达了自身的爱国立场,更代表了全国人民对外来侵略的义愤之情。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持否定态度,并电令时任“上海特派员”的杨晟对上海的“排日活动”予以密切监视^{[6]183}。1915年5月9日凌晨1点钟,袁世凯更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亲往日使馆递交复文,对日本最后通牒要求各节,概予承认”^{[1]802}。

从1915年2月份上海工商代表的“通电抗议”到5月9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为止,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从前后持续时间来看也仅历三月左右,而且最后中日关于“二十一条”交涉的最终结局也未能按照爱国群众所希望的方式结束,但从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演变及近代爱国主义传统的发展来看,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总结的东西。

首先,1915年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斗争的特点就值得我们当时的历史史实出发,做出客观的分析。

1. 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具有广泛性。上海民众斗争的广泛性不仅体现在其斗争方式从通电、集会、抵制日货、组织爱国储金等不一而足的多样性上,更体现于参加斗争群众阶层的广泛性上。除了前述普通市民阶层和工商界人士之外,甚至连生活在上海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工人也以罢工的形式参加了斗争。如据《申报》载,1915年4月中旬,“沪西小沙渡日商第五纱厂工头李金标、俞金求、徐金方”率工人赵小弟等27人,以工资发放时间调整为由,向日本资方抗议,“击毁门窗机器等件,经该厂日人用电话报告戈登路捕房,及至警察荷枪前往制止,工人仍不服”^[10]。

2. 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斗争的过程中也体现出了较高的理智性。由于民初上海城市已然具有了较高的国际性和文明性的特征,上海民众在反对“二十一条”斗争的过程中并未将对日本政府的义愤迁移到普通的日本民众身上,反而在一些具体事件的舆论关注中依然体现出了较为冷静、客观和理智的态度。如,1915年4月10日凌晨,日本轮船第

二永田丸(一千吨)由上海开往烟台,“驶至三夹水,忽遇浓雾,致触礁石”,前往救援的永乐丸(二千六百吨)“因风浪甚急”,“亦在附近搁浅”^[11]。事件发生后,尽管上海各界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但上海媒体仍做出了非常客观、冷静和理智的评论,谓:“此次中日感情不免有所抱憾者非他,为国事也,即我国商民激而为抵制之谋者亦仅欲为国交之后援,与彼国之商民初无关系,故抵制虽力而感情犹昔,我人所以一闻日本两轮船失事不能不为惋惜,更闻人命无伤而人为之欣幸焉”^[12]。

3. 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还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持久性。虽然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了“二十一条”,上海人民的反对斗争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但上海各界爱国者的斗争并未就此停止,而是以一种更加深沉的形式在延续。如就在“二十一条”正式签订生效的一个月后,“唐绍仪、伍廷芳、李登辉等在中国青年会举行中华共济会成立会。与会者一致认为今日中华犹如孤舟航行在怒涛海浪中,不群策群力,难免倾覆,因此发起成立中华共济会。该会称其宗旨是增进内外国民团结,唤起爱国热忱,融合中外意见,祛除彼此误会。该会下设教育部,从事推广教育普及;实业部,从事考查中外实业,振兴国内工业;体育部,从事强健国民身体活动,并在各地招募民团,以备为国之需”^{[3]188}。显而易见,1915年6月10日中华共济会的成立不仅代表了上海民众反抗斗争形式的变化,更是其后续坚持的一个缩影。

其次,1915年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斗争的历史意义也需要认真总结。

1. 上海人民的反对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袁世凯政府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中日两国交涉“二十一条”之时,上海人民的反对斗争给了袁世凯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较为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抵制日货行动的开展,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效果。1915年3月25日,鉴于上海提倡国货运动之盛行,袁世凯密令杨晟“切实宣导”,而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为上海抵制日货事,照会外交部恫吓”,北京政府答称“已命上海交涉使与工商局会商办法,以免续有此种不幸之举动”^{[1]800}。毫无疑问,中日双方政府越是焦躁不安就越是印证了上海民众斗争的威力。

2. 上海人民的反对斗争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更体现并提升了近代上海的城市性格。上海是近代中国遭受外来侵略最早的城市

之一,因此其爱国主义和反抗意识也最强,而且由于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上海民众也逐渐养成了较为普遍的公共参与意识。1915年的反对“二十一条”斗争正是这两种城市性格特质的体现。不仅如此,此次斗争反过来也进一步促使上述两个方面有了更进一步的升华。就爱国主义话语下的民众动员和公共参与程度而言,上海人民的反对斗争就体现出了“全市动员”、“人人参与”的彻底性,甚至连妇女界也不甘人后,积极参与了进来。如当各界群众开展救国储金运动时,女界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915年4月11日,“中华妇女救亡储金会举行发起会,通过章程草案,决定筹建中华妇女救亡储金会。设总机关于上海,总机关内设交际、劝导、会计、收发等科,储金以1亿元为定额,存期为3年。其宗旨是‘唤起中华妇女界急公好义,力任储金,协助国家要用,发展国家实力,挽救国家危亡’。17日,在法租界嵩山路任元里国粹研究社设立临时通讯处,开展妇女储金运动。”^{[3]186}

3. 上海人民的反对斗争也为反袁斗争的后续开展做了历史的铺垫,成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很多历史事实都表明,上海民众反对“二十一条”斗争的过程中就一直穿插着革命党人的反袁线索。如就在日本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第四天,由于预感到民众情绪的即将波动,革命党人丁世杰“由上海赴东京”,“向孙中山面陈吴藻华经营江苏军事情形,孙仍派丁回沪维持”;1月29日,吴忠信由上海至东京,向中华革命党军事部陈述“沪事”^{[1]793}。3月10日,孙中山特命中华革命党党务部,揭露袁世凯对日本“二十一条交涉真相”,并通告党

员积极反袁。而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第二天,中华革命党军事部副部长周应时由上海致函谢持,称“沪上人心,恨日恨袁,已达极点”,“时势既变,吾党之方针,自不能坚持不变”,“务请力主开会讨论,公决施行”^{[1]803}。揆诸史实,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在上海人民反对“二十一条”斗争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上海人民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也为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和社会基础,同时更起到了一定的掩护作用。

参考文献

- [1] 汤志钧. 近代上海大事记[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 [2] 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泣告爱国同胞书》[N]. 申报, 1915-03-02(10).
- [3] 夏东元. 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5.
- [4] 电令[N]. 申报, 1915-03-20(10).
- [5] 日人最后通牒之抗议[N]. 申报, 1915-05-09(10).
- [6] 林明德.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 中日关系史料[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6.
- [7] 刘惠吾. 上海近代史: 下[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 [8] 提倡国货之成效[N]. 申报, 1915-04-17(10).
- [9] 组织国货公司之缘起[N]. 申报, 1915-04-18(10).
- [10] 工人大闹纱厂之结果[N]. 申报, 1915-04-14(10).
- [11] 日本两轮船同日失事[N]. 申报, 1915-04-14(10).
- [12] 杂评三: 日本两轮船失事[N]. 申报, 1915-04-14(10).

On the Shanghai People's Struggles Opposing to the "Twenty-One" Treaty in 1915

XIE Zhong-qiang

(Yun-cheng University Yuncheng 044000 China)

Abstract Japan proposed the "twenty-one" treaty to Yuan Shikai on January 18, 1915, aiming at subjugating China. As the news spread, Shanghai society made rapid reac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protest activities, Shanghai community also launched a boycott of Japanese goods and patriotic savings movement. Although a series of struggles could not change the outcome of Yuan Shikai's admit to the traitorous treaties, but it still had a positiv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Shanghai people; oppose to the "Twenty-one" treaty; assembly protest; economic struggles

编辑 张 莉